



爱兵爱民的皮定均

□ 张世贵

皮定均于1914年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戴家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近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南征北战，屡建奇勋，传奇颇多。徐向前赞誉他“多谋善战，英勇虎将”。李先念称赞他“智勇兼优，光明磊落”。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评定军衔时，皮定均按资历只能评为少将军衔，但毛泽东特批：“皮有功，少晋中”，因而直接晋升中将军衔。皮定均不仅英勇善战、治军有方，而且爱兵爱民真挚深切，令人景仰。

“没有战士，哪来的首长？”

“爱兵爱兵永留芳”，这是张爱萍在悼念诗中对皮定均的评价。长征路上过草地时，有个姓方的战士连饿带累走不动，把背包丢了。晚上，皮定均查铺，发现他没有被子，一个人蜷伏在土堆旁。皮定均非常心痛，便将自己的被子拿来盖在他的身上。小方吃力地摆着手，低声说道：“我已经快不行了，不要冻坏了首长。”皮定均说：“没有战士，哪来的首长？”说着，往他身边一躺，用被子盖住了两个人，说道：“我俩一块儿睡，这该行了吧。”就这样，两人相互依偎着取暖，抵御着草地上的严寒。一觉醒来，天已微明。皮定均推了推身旁的小方，发现他已经牺牲了。皮定均站起来，细细地把小方的遗容打量了一番：只见他已经僵硬的身体微微向佝偻着，在熹微的晨光中，苍白的脸上似乎还带着温暖的微笑。皮定均默默脱下军帽，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据济南军区原政治委员宋清渭回忆，1964年8月，他在霞浦某边防团任政委，一天，皮定均冒着炎炎烈日，坐着卡车到他下属的一个连队视察。中午11时多，皮定均转到了这个连队的猪圈，看到一个饲养员正冒着酷暑在外面剥猪草。皮定均停住了，大声喊道：“宋清渭！”宋清渭立即回答：“到！”皮定均笑眯眯地看着他说：“你过来，给我站在这里，站一个小时！”宋清渭马上意识到皮定均的用意，他立即说：“首长，您是不是批评我们让战士在大太阳底下剥猪草，连个棚子也不搭？”

皮定均笑道：“你说的差不多，

就是这个事！”他接着说：“我们当干部的要处处关心战士，时刻装着官兵的疾苦。天这么热，太阳这么毒，让战士长时间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劳动，不近人情嘛！我们常说要关心战士，关心战士不是空的，是实的。爱护战士不是光讲讲就行了，要体现在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上。”宋清渭当即表示：“我们立即给他搭个棚子，先用树枝、凉席搭个简易的，然后再搭好的。”晚饭后，皮定均又悄悄派秘书检查棚子的落实情况。秘书回来向皮报告说棚子已经搭好，皮定均满意地说：“那好，布置的事办了就好，就应该这样。”皮定均爱兵爱得实在、具体，抓工作深入、细致、到位，使大家终身难忘。

“能解决多少算多少，总比知道了不管要强”

皮定均对人民群众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抗日战争时期，在豫北、豫西遭受严重蝗灾时，他指示部队每人每天要节约一两粮，帮助人民克服困难，度过灾荒。那时，他自己每天也只以半斤粮食合着野菜度日，还带领部队利用作战和训练间隙，消灭蝗虫，保护庄稼。皮定均十分重视部队的生产建设和改善战士的生活。他常说，把部队的生产搞好了，不仅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还可减轻地方压力，有利于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971年，宁夏固原地区遭受自然灾害，他慷慨解囊，把自己的所有便衣和部分积蓄捐献给灾区人民。在兼任甘肃省委书记时，他了解到张掖地区有不少人没有衣服穿，就搜罗家里所有旧衣服与配发的布票，全部捐出，还发动干部募捐了一些衣被鞋袜送去。有人说，那地方太穷，这些东西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皮定均回答说：“能解决多少算多少，总比知道了不管要强。”

爱心不仅体现了本色，更在于真心实意为民想办法找路子。在福州部队工作期间，皮定均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了一套搞好连队生产和改善连队生活的措施。在兰州军区期间，当时西北部队从基层到机关生活比较艰苦。冬季取暖普遍用的是煤炉子，放在屋里，

煤烟污染呛人不说，煤气中毒事件也时有发生，夺去了多名年轻战士的生命。对此，皮定均既非常难过，又心急如焚。那个年代经费奇缺，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改善取暖条件，于是，他下部队时常带着这个问题寻求答案。在某师，他发现有一种火墙比较安全，便在部队普遍推广这个做法。火墙修好后，基本上没有再发生煤气中毒事故。作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皮定均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革命本色。他很少使用上级配备的专用红旗轿车，说它招眼，外出时他多是乘坐吉普车。他到基层检查工作，不准事先打招呼，不准搞特殊招待。有一次去银川，宁夏军区的同志想把他安排在宾馆住宿，他硬是要住到连队去，说那样高级的房间，一晚上几十块钱，想想老百姓的收入，自己就舍不得住。皮定均从不利用职权谋私利、走后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他就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军垦农场去锻炼。后来，为了不让孩子们有优越感，给组织上添麻烦，他又建议把孩子们分到外地工作。他还经常教育身边工作同志，不能对下属指手画脚，不准向基层打招呼办私事，要把为人民服务从自己和身边人做起。

“我本来就是大别山上的小放牛娃”

1966年春，皮定均带领福州军区机关部分同志到江西省修水县农村帮助工作。当时，地、县的一些领导劝他：“您年纪大了，不能和青年人一起搞‘三同’，住在县招待所里，走一走，看一看，就行了。”皮定均婉言谢绝了这番好意，再三坚持要下基层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进村的那一天，他身背背包，肩扛锄头，和机关干部一起进村，住进了离县城50多里的赤江公社福联大队饲养员罗大爷家里。他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吃的是红薯丝掺杂大米的薯丝饭，睡的是稻草铺。虽然白天劳动很累，但他每晚还和社员拉家常。早上天蒙蒙亮，他就起床到村子周围去为农田拾粪施肥。罗大娘说：“老皮不像官，像个老农民！”特别是他亲手用竹片精心制作的牛鼻栓，更深受全大队饲养员的赞赏，罗大爷说：“老皮呀！你是真放过牛的呀！我放

了一辈子牛，做的牛鼻栓还不如你做的有用啊！”皮定均说：“我本来就是大别山上的小放牛娃，是穿着开裆裤在牛背上长大的，地主、老财不让我活，逼我出来闹革命，现在当了官，可不能忘了本呀！”

罗大爷支气管有老毛病，夜里怕冷经常咳嗽。当时虽已春天，但夜晚仍有凉意，每天晚上，皮定均总要把自己的棉大衣让罗大爷盖在被子上。罗大爷几次推辞，但经不住皮定均一再诚恳劝说，终于接受了。多年后他还记得“老皮的棉大衣暖和”。就这样，从紫云英开花的3月，到稻花飘香的7月，皮定均在赤江公社当了5个月的农民。直到他离开之后，群众才知道，住在罗大爷家的“老皮”，原来就是指挥闽赣两省千军万马的皮定均司令员！

“怎不想在家多住几日？”

1953年夏，皮定均离别家乡24年后首次返乡探亲。他携妻带子，荣归故里，四乡八邻都赶过来了，父老乡亲前来探望者，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皮定均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他断然决定率全家离乡返回，许多乡亲对此感到纳闷不解，有的甚至说他不久人情。其后皮定均再也没有回乡。据说，当天返回的途中，遇上大雨，山洪暴发，雷声如炸。当地人还传将军无情无义，恐遭天怒。对此，皮定均的夫人张烽多年后坦言：“当时我也不明白，未回乡时他朝思暮想，回乡后只住一日便走。返回途中，他一言未发，任我牢骚满腹。数年后，他才吐露心迹。”张烽说到这时时哽咽不已：“他说怎不想在家多住几日？但见与其一起参加革命者都已战死沙场，仅自己一人生还，荣归故里，如何向先死者家人交代！回乡后，乡亲们纷纷询问其亲人下落，心里怎受得了？”据金寨县志记载，上世纪30年代，全县曾有10万青年参加红军，幸存者仅数千。与皮定均一同参军有14人，其余无一生还。皮定均感念于此，返乡情怯，时人哪里知道皮定均内心的痛苦？戎马一生，丹心一片，只是无以言表。



“三迎红军”：浙西南革命中的军民团结

核心阅读

伟大的革命实践创造伟大的精神，在浙西南革命中，红军挺进师深入浙西南，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出现了当地农军“三迎红军”的生动局面，走出一条军民合作的道路，最终缔造了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即忠诚使命、求是挺进和植根人民。

松阳地界，就感受到这里老百姓的热情、贴近与无私。事实证明这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明智之举，因而挽救了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挺进师。

“三迎红军”是浙西南人民革命性的生动诠释

“三迎红军”的出現本身有其必然性，并不是“二陈一卢”偶然兴致使然，或是因为红军部队兵临城下，慑于其势而不得已为之。其实，在松阳浙西南边境之安民、枫坪、玉岩及大东坝两乡两镇，早在1926年就开始了“二五”减租减息斗争。从那时起，广大贫苦山民在“二陈一卢”等领导下，开展过反帝爱国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1928年，他们喊出了“耕者

七七事变后，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撤出城市，转到农村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and 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山东乐陵抗日武装斗争迅速发展。1937年7月中旬，中共津南工委召开会议，决定所属各县开展武装斗争。15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后改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在乐陵县旧县镇（今属河北省盐山县）成立。这是山东省第一个抗日民众团体。

与此同时，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宣告建立。8月13日，乐陵县的共产党员杜步舟和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周凯东发动党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筹措步枪60多支，大刀50把，组建起一支130人的队伍，在黄夹镇北街宣布起义。黄夹起义是山东省最早的抗日武装起义，谱写了具有乐陵地方特色的大刀杀敌的英勇故事。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乐陵举起了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第一面旗帜！1937年10月，中共北方局决定，由山东省委统一领导津浦路东的盐山、沧县、宁津、庆云、乐陵、阳信、无棣、东光、南皮、惠民等县的党组织，组建了中共冀鲁边工委，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7年8月中旬，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向南进犯，9月24日占领沧县。10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所辖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率部在德县与日军拼死激战，守城官兵几乎全部殉国。5日凌晨，德县失守。11月8日，日军第一〇九师团第一一八旅团从沧县进犯盐山并占领县城。11月10日，日军兵分东、西二路南侵，西路日军攻占旧县镇，旋即通过高津河大桥入侵乐陵。乐陵国民政府县长李念洲放弃河岸阵地，逃离乐陵；同日，东路日军攻占庆云县城（今河北省盐山县庆云镇），随即沿南运河北岸西行，由三间堂大桥进入乐陵，遭到乐陵县芦店区区长、中共党员韩国珍和东辛店乡农学校校长苏明等组织的抗日武装顽强抵抗。

三间堂坐落于高津河南岸，是当时乐陵县的四大集镇之一。由此向南有片枣林，树木浓密，遮天蔽日，南北绵延几十里，是部队埋伏的天然屏障。苏明在《他引导我走向革命——忆钱杰东同志》中回忆道：日军自庆云县向乐陵县进攻，共有七辆装甲汽车。我们守的是公路两旁的枣树林，公路上放了一些农民的犁耙。中午时分，敌人的车队到达。我们即自公路两旁向敌人开火，战斗约十几个小时，双方相持不下。敌人又从庆云县调来迫击炮，向我们轰击，最后双方都撤退了。当时，县城早已失守。

此次阻击战从11月10日中午一直持续到夜晚，敌我双方互有伤亡。

打响山东抗战第一枪

记乐陵县枣林阻击战

□ 杨宽情 房绍良

当得知乐陵县城沦陷后，韩国珍、苏明命令队伍撤离阵地，按原计划向阳信县境内转移。关于此战，《中共乐陵地方史》也有记载：“西路日寇当晚占了齐家油坊，乘虚攻入乐陵……在东路，日寇遭到我地下党员、二三区区长韩国珍率领的抗日武装的顽强抵抗。”枣林阻击战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山东抗战第一枪！

其后，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带领群众武装抗战，创建了以乐陵为中心区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关内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该根据地包括24个县，约600万人口。在这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上，冀鲁边区军民不畏强敌，浴血抗战，对敌作战近千次，歼灭日伪军数万人，90多名县团级干部、10万多名民众献出了宝贵生命。在民政部公布的著名抗日英烈中，冀鲁边区有29人，占到1/30。冀鲁边区抗战是最艰苦、最残酷的抗战，为山东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孕育了“大爱为国、敢为人先、不屈不挠、团结奉献”的冀鲁边精神！

“三迎红军”打开了浙西南军民团结合作的新局面

“三迎红军”是由松阳农军领袖主动组织的，是在当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他们所能提供的最高礼节及欢迎仪式。自此，挺进师结束了自1934年7月离开中央苏区后一直处在被敌人前堵后追的极其艰难困苦的地境。他们一进入松阳地界，便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永福寺内外群情激昂，大批民众簇拥着红军战士，嘘寒问暖，握手相庆，仿佛是回到了久别的中央苏区一样，与几个月来在边界辗转疲于奔命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了“三迎红军”这个良好开端，挺进师主力得以在大半个浙江扩军游击，扩大红军影响，以实现中央赋予的吸引、牵制敌人，从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之目标。从此，挺进师完成“进入浙江、长期行动，开创新的根据地”这一艰巨任务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诚然，“三迎红军”的场面在今人看来，或许不那么宏大壮观，但是，“三迎红军”的意义在于那来自人民群众的热情，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地区，却出现了热情迎接红军的一幕，的确是十分难能可贵。这对处于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挺进师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而对当地坚持斗争的农军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则是有了党的领导和革命的方向。可以说，没有红军挺进浙西南，没有浙西南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浙西南地区不可能掀起全国革命的局部高潮。



□ 洪关旺 刘关洲

1935年5月10日，红军挺进师主力在刘英、粟裕率领下，历尽千辛万苦进入浙江省松阳县西南边界。下午，浙西南农军（当地叫“青帮”）首领陈凤生、副首领陈丹山在安岱后外垵寺岭头迎候；11日上午，农军副首领卢子敬率领38名农军战士和学生举着红绿彩旗，敲锣打鼓在水店外幕寮列队欢迎；下午，在斗潭永福寺，“二陈一卢”召开欢迎红军大会，喊出“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政治口号，并由此形成“青”“红”大联合，军民合作开辟根据地的良好局面，史称“三迎红军”。

“三迎红军”开创了浙西南地区军民合作的新局面，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和保卫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之后，挺进师迅速组建了浙西南“地方政治工作团”，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有松遂龙边三县的农军和革命群众广泛参与，迅速聚集在共产党和红军旗帜下，形成了一股澎湃的革命洪流。继而在6月初的小吉会议上，挺进师政委全面部署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任务：围绕根据地建设的武装斗争为第一要务；根据地的党政群团组织建设是主体；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则是指标性任务；快速开辟、全面建设根据地里的交通联络情报机构，力争在半年时间里基本完成。挺进师之革命星火，在浙西

南俨然成了燎原之势，红了大半个浙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军民团结合作、携手共建这一关键。

“三迎红军”为红军挺进师立足浙西南提供了群众基础

“三迎红军”创举与挺进师立足浙西南，与根据地军民齐发动、全参与、快速开辟、全面建设以及后来的根据地保卫战，血凝山川之英勇壮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三迎红军”最后的欢迎大会上，“二陈一卢”提出了“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口号，旗帜鲜明地把当地农军和群众号召起来，并开始努力践行这一口号。它既是农军首领面对广大群众的号令，又形象地比喻了红花绿叶相衬托、军民鱼水情深的关系。就红军挺进师来讲，欣然接受军民大联合、开辟根据地这个事实，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在来松阳县之前，挺进师已得知在浙西南腹地有这么一支人数众多的农军队伍，还有“二陈一卢”为首领的大批革命志士，对这里的革命群众基础，他们已相当了解。所以才会在新打开浙突破口后，大踏步地挺进松阳，急切地要与“二陈一卢”相会。挺进师首长一进入

下了初步的革命群众基础。所以说，“三迎红军”的创举，在浙西南有其必然性。

“三迎红军”集中体现了当地革命领导人的先进性

假“青帮”之名，行农军之实的“二陈一卢”，其实是松遂龙边的农运领袖。这里的“青帮”，与上海滩黑社会帮派组织之“青帮”完全不同，它是一种斗争策略，实际行的是“均贫富、平地权”的革命群众运动。因此一旦他们有所动作，便被国民党当局当作赤色革命组织施以残酷迫害，大肆镇压。并且，他们也不等同于那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山大王。他们是生存于穷苦百姓中，并为穷人伸张正义、不畏权贵、敢作敢为的英雄好汉，是革命的同路人，共产党和红军的坚定拥护、支持者。当红军到来时，他们便义无反顾地聚集在红军旗帜下，并且奋不顾身地甘愿献出一切。这些特点及群众基础，决定了他们是红军可以信赖、依靠的革命力量。这也有力地诠释了为什么会有“三迎红军”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壮举，一个浙西南特例。